

中国知识分子论

—从 1980 年代到 2000 年代—*

许纪霖¹

●**铃木规夫（主持人）：** 今天，2010 年度第一次 ICCS 政治外交研究会和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共同邀请许纪霖先生来为我们做报告。我是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 ICCS 运营委员、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铃木。

许先生以 20 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知识分子研究以及上海都市文化研究为自身的研究课题，执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在中国也是一位十分有名的教授。7 月份，许先生作为 ICCS 的客员教授来到日本。随后，加加美先生也会做详细的评论。如事先告知的内容一样，今天许先生将就《中国知识分子论——从 1980 年代到 2000 年代》这一课题，为我们做报告。

这一课题对于日本的知识分子来说也是非常感兴趣的。在日本，这一时期“左翼”处于从论坛上消失的状态。“左翼”也如文字所示，陷入了“左翼”的状态。我们可以称他们为保守派，也就是说，赋有新保守主义的倾向席卷了日本的杂志论坛。虽然左翼性言论在知识分子中处于渐渐消失的状况，但不知为何，至今身处民主党政权主流位置的确是一些“以往的左翼”。无论从政治构造还是从思想意识形态来看，在思考知识分子的问题时，20 世纪后半期到 21 世纪这一段时期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也确实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时代。在美国，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的人们基本上也都是 1960 年代的左翼，因此想必展开知识分子论也是非常困难的。这和 1930 年代思想意识形态构造明确的知识分子论是不同的，因为知识分子论非常复杂，无法进行单纯的区分。尤其是在中国，1980 年代到 2000 年代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又是

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难得许先生在日本为我们做这样的报告，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结合自身在日本以及其它方面的经验，踊跃地参加讨论。

今天我们有充裕的时间，所以请大家积极发言。那么，现在有请许先生为我们做报告。



●**许纪霖（报告者）：** 首先我要感谢加加美教授和铃木教授邀请我来参加本年度的 ICCS 政治外交研究会，并感谢两位教授给予我和大家交流的机会。今天我想就 1980 年代以来的 30 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给大家做一个报告。有关这一问题可以从许多角度来报告，今天我主要想谈谈这 30 年中国思想界发生的一些变化。

我这里要做一个特别的说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分布在三个领域中。它们分别是理论界、学术界和思想界。

“理论界”主要指的是，为中国共产党以及政府官方意识形态服务的部门。例如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各地方社科院等一些部门。第二个是“学术界”。即各个大学以不同的学科为基础构筑成的搞研究的地方。比如说历史、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



今天我想报告的是第三个领域，即“思想界”。“思想界”只是民间性的，它不属于政府和官方。这是思想界和理论界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并且，思想界和学术界也不一样。思想界讨论的不是被学问领域化的专业知识，而是讨论一些重大的具有公共性的政治与社会问题。思想界出版自己的杂志。最有名的则是创刊30年以上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读书》杂志。现代思想界最初产生于1980年代初期，在此后的整个1980年代形成了一个阵营，我把它称为“启蒙的阵营”。但是，到了1990年代，这一“启蒙共同体”开始分裂，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派别。最近10年这一分裂越发激烈，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今天我想向各位报告的就是这30年间在三个不同的年代思想界所发生的变化。这里有一份中文的稿子，请各位参看。由于时间有限，我将挑选一些重要的内容进行简单的说明。

第一，我想谈谈1980年代。1980年代的思想界，前后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思想解放运动”，第二个是“新启蒙运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出现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和邓小平改变毛泽东的路线，开始搞世俗化的社会主义有关。当时中共党内存在一批比较解放的知识分子，比如周扬、王若水、王元化。党外则有李泽厚等人。当时，他们都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搞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他们应用的是早期的马克思理论，即“异化理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本身也会产生异

化，也会出现封建性专制。其最大的原因是放弃了人道主义。因此他们高举人道主义的旗帜。早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核心成员都是一些持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中出现了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里面是解决不了的。

19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批新的知识分子，他们开始发起了一场新的运动。这场运动当时叫做“文化热”，现在叫“新启蒙运动”。“思想解放运动”是在中共的体制内部发生的，而“新启蒙运动”则是在中共的体制外、在民间的思想界发生的。

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主要有三派人。分别是“走向未来派”、“文化：中国与世界派”以及“中国文化书院派”。《走向未来》是一套由金观涛先生主编的杂志和丛书。金观涛先生前几年来 ICCS 做过访问教授。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所以他强调的是用科学来进行思想解放。所以，“走向未来派”被认为是科学派，他们重视的是科学的理性主义。

第二派叫“文化：中国与世界派”。这也是一套丛书，主编是甘阳。他们主要的成员来自于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一批年轻的人文学者。由于他们更关心的是从西方的古典到现代的各种各样的人文主义的思潮，所以也可称其为“人文派”。

第三派是“中国文化书院派”。“中国文化书院”是北京大学部分学者创办的一个民间的书院（学术团体），哲学家汤一介为主管。他们并不赞成在1980年代比较主流的批判中国文化传统的意见。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怀有敬意，希望把现代化和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1980年代的这三派知识分子之间虽然有很多争论，但是他们都属于一个共同的启蒙共同体。之所以他们能处于同一个共同体是因为他们当时有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敌人。所谓共同的目标是指像西方那样的现代化国家，即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以及个人主义的实现。而他们的共同的敌人则是毛泽东留下来的传统的社会

主义的制度及思想。以上是 1980 年代的基本状况。

1989 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以后，其情况发生了变化。经过 3 年的过渡期，1992 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期。现代化的部分目标开始实现。例如市场经济，从 1992 年以后中国出现了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本来是 1980 年代的知识分子所希望的，但是真正出现以后他们自己最先成为了市场经济的受害者。当时有一些流行的说法，比如说“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所以，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被第二次边缘化。这次是经济的边缘化。第一次边缘化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边缘化。

1994 年《读书》杂志中出现了一场非常著名的讨论，即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当初，包括我，一些上海的知识分子首先展开了这一讨论。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发现整个中国弥漫着物质主义，而原来所具有的人文精神却丧失了。

但也有部分知识分子不同意这一看法。他们认为人文精神中国从未有过，何谓当代失去人文精神了呢？比如当时有一位著名的作家王蒙。他当过文化部长，当时他就责问人文精神派说，“难道你们要回到改革开放之前吗？”在市场经济的潮流面前，1990 年代的知识分子首先发生了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拥抱市场，而另外一些知识分子则开始激烈地批判市场。

1996 年底，汪晖在《天涯》杂志上发表了《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这篇文章挑起了一场更大的论争。从此中国思想界分化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两派。这场论战持续了三年多时间，它的涉及范围之广，参加的人之多是这三十年中唯一的一次。经过这场论战以后，中国思想界的知识分子发生了彻底的分裂。这种分裂可以分为几个方面，分别是利益的分裂、目标的分裂以及知识结构的分裂。

首先，中国知识分子的利益开始分化。199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急剧动荡，开始出现了两极分化。那么，知识分子究竟应该代表谁的利益呢？这在知识分子的内部发生了两极化的倾向。

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所以知识分子应该代表他们的利益。这部分知识分子很多是经济学家，身处经济学界。所以，中国很多经济学家同时也是很多著名公司的董事。

但是另外一部分知识分子并不满意在社会急剧发展中社会底层所受到的伤害。这些人中有些是新左派，也有些是自由主义者。他们认为他们应该为底层民众说话。

还有第三种意见则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代表别人的利益，最重要的知识分子要代表社会普遍的正义和良知。

所以我们看到，199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在利益上已经完全分化，它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共同体。

第二个分化是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的分化。1980 年代，启蒙的知识分子读的书都大同小异。所以，他们的知识结构是相似的。但是到了 1990 年代以后，大量的西方的思潮被介绍到中国，然后各种各样的“主义”也随之进入了中国。因此，不同的知识分子都有自己的主义以及自我独特的理论。他们各自相距甚远的知识结构已使得他们无法展开对话。于是，1990 年代后期的争论中出现了更多彼此间的误解。这种误解和各自的理论背景是有关联的。

第三个分化是各自目标的追求上的分化。原本在 1980 年代，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西方那样的现代化，但是到了 1990 年代，他们在对西方的态度上也发生了变化。

在新左派看来，西方不仅是一个值得学习的目标，而且是一个需要批判的对象。新左派追求的是一种新的理想，当时他们称之为“自主创新”。

所以到 1990 年代末，中国思想界的知识分子已经完全分裂了，共同的启蒙共同体已不复存在了。本来从 1980 年代一路走来的启蒙知识分子许多彼此间都是朋友，而到了 1990 年代末都已成为了敌人。他们相互间不仅有观点上的分歧，而且连感情都发生了分裂。所以，一旦发生什么事情问的是“你站在哪一边？”，而不是“这一事情的是非是怎样的？”

我特别想强调的是，我们不能说中国知识分子在涉及到中国改革问题上只有两派人，一派为自由主义，另一派为新左派。这是一个比较单纯性的理解。

在我看来，在涉及到中国的发展和改革的问题上，中国思想界目前有五个派别。

第一派可以称之为“发展主义”。他们主要是一些像北京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那样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他们看来，中国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而政治改革可以放到下一步再考虑。所以，发展是最重要的，其它问题都可以在发展后解决。这部分的意见和中共政府的主流意识形态有重合的部分，同时他们也代表了相当多的经济学界精英们的意见和利益。

第二派是海耶克 (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式的自由主义者。这些自由主义者可以说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在他们看来中国不仅需要市场经济，而且还需要现政民主。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是，权力没有推出市场，借朱学勤的话来说是“有一只看得见的脚干扰了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指的是市场经济，“看得见的脚”指的是政府的权力，在他们看来，那只“看得见的脚”干扰了那只“看不见的手”。所以他们核心的要求是要中国尽快地实行政治改革，建立宪民主政治，让政府退出市场。

第三派是“新左派”。新左派认为中国今天的问题主要来自于资本主义。即中国接受了华盛顿的新自由主义的这套理想。在新左派看来，中国今天已经被资本主义化了，所以最重

要的是要克服这种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的传统。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传统一部分来自于西方的左派理论和思想，另一部分则来自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传统。

第四派，我把它称为“左派自由主义”。这和我刚才说的海耶克式的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他们认为不能完全靠市场，同时还要靠国家力量的调节。他们相信的不是海耶克而是罗兹。也就是说，中国不仅需要自由，也需要平等，这两个价值都是中国所需要的。这些自由主义，我们也可以把他们认为是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赞成立宪民主政治，但是认为同时还需要公民的政治和公民的文化。

最后一派是“政治的保守主义”。这一派在 1980 年代末和 1990 年代初曾经以新权威主义的方式出现过。到了 1990 年代末以后，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和新的代表人物。

举一个最新的例子就是，在几年前有一个学者曾经写过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那篇文章叫作《民主是一个好东西》。这个作者是中共中央编译局的俞可平。俞可平一直被传说是胡锦涛的高级顾问。他这两年不再提“民主”，而开始提另外一个概念，叫“善治”。“善治”和“民主”不同。民主的重点是人民的统治，“善治”则是统治者如何更好地进行良好的统治。如何良好地代表民众的意见和利益，我们知道这都是儒家政治的传统。这样一种政治的保守主义过去只是出现在中共政府的理论界，但是这几年也开始在民间的思想界流行。

所以，介绍了以上五种派别以后，我们就可以发现关于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不仅表现在宏观的理论里，而且在几乎中国所有的问题上都有严重的分歧。在中国，1980 年代出现的启蒙这一理想到今天尚未实现和完成，而且受到了更加严峻的挑战。这个挑战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挑战是国家主义思潮的挑战。我们知道，启蒙强调的是个人，但是国家主义强调的是国家的发展。这几年来有一种声音在中国越来越强烈，即“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在一部分人看来就是国家的崛起，就是国家的实力的加强，所以国家的问题这几年成为中国讨论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1980年代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个人”。1990年代由于社会分化以后，讨论的问题则变为“阶级”。而这几年，“国家”这一问题越来越突出，成为争论的对象。

启蒙的第二个挑战来自于古典主义。前几年，出现了一位很有名的人物，她在中央电视台讲孔子和庄子。这个人叫于丹。于丹是北京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一位年轻的教授。她用非常时髦的方式给大家讲《论语》和《庄子》，被称为“心灵鸡汤”。她的书在中国发行到了几百万册。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因为这几年城市的人开始富裕了，但是有了钱以后，心灵却出现了空虚。很多人希望从古典的哲学和宗教中寻找精神的寄托，所以出现了古典主义热。

这个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国古代经典热，比如说从孔子的思想到庄子的思想、从老子的思想到佛教的思想等等。另一方面是西方古典热。西方古典包括古希腊和基督教。不论是中国的古典主义者，还是西方的古典主义者，他们都激烈地批判现代性。所以他们这些人和1990年代所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是不一样的。最初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或承认现代化人考虑的是怎么把儒家文化和现代文化结合起来。但是今天的这些保守主义者认为现代主义者的所有一切都是错误的。他们想用回报古典的方式来建立另外一种现代性。

启蒙的第三个思潮是文化相对主义。在198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以为现代性只有一种，即西方的现代性。但是今天有很多文化相对主义者认为太阳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多个，

中国可以完全走一走和西方不一样的道路，也就是说中国模式是存在的。

刚才谈到的这三种思潮相互间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相互结合的趋势的。它们表现为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它们共同的目标是要落实在“中国崛起”这个问题上。不管是激进的新左派思潮还是保守的国家主义思潮都存在这一倾向。

第二个我们发现激进的新左派思潮和保守的国家主义思潮之间开始建立了同盟的关系。这是因为稳健的国家主义正向保守的国家主义发生着改变。

去年中国有一本书叫《中国不高兴》发行了50多万册，它很能代表这样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这本书所讲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国要成为一个强国，在世界上崛起，要带着宝剑去做生意，叫“持剑经商”。中国的象征不再是拥有古老的文明，而是中国今天是一个有实力有资格表现出自己不高兴的一个国家。

第三个转变是从原来关心国家的内部问题转向了关心国家与世界外部的关系。

所以说中国思想界的变化是相当巨大的，和1980年代相比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面貌。这些思想不仅停留在观念形态，而且有些开始影响到中国高层的决策。

在中国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以及民族的各种问题上，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有一些具体的理论分析。这些不同的思想可以证明未来中国的发展有多么多的可能性。所以今天中国面临的复杂性也是历史上少有的。我们通过这30年思想的变化也可以来更深刻地理解未来中国各种变化的可能性。

以上是我的报告内容。以下希望听取各位教授的意见和批评。谢谢大家！

●铃木（主持人）：十分感谢！接下来请加美先生做点评，然后进行全体讨论。

●加加美光行（讨论者）：那么，我先来做一个点评。首先，我想谈一下有关1980年代后半期的“新启蒙运动”以及“文化热”问题。众所周知，1980年代后半期的“文化热”和“新启蒙运动”最终导致了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那么，为什么1980年代后半期的“文化热”和“新启蒙运动”会引起如此之大的悲剧？

其根本的理由是“新启蒙运动”以及他们的讨论产生了和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对话的势力。赵紫阳是其代表性的人物。“新启蒙运动”和学生的民主化运动有一定的连动性。正如刚才许先生所说，在当时的“新启蒙运动”和“文化热”中，其启蒙具有共同点，存在认识上的共同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例如，1986年末以后，以方励之为首的全国150多所大学的学生发起了民主化运动。当时香港的杂志《争鸣》报道了胡耀邦和学生之间的民主化运动的悲剧。当时的学生游行受到了胡耀邦等人的同情。1986年末，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领导人对此做了批评，1987年1月，胡耀邦辞去了总书记的职务。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引起了一种新的状况。有关官僚腐败问题，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暴露了中央领导人太子党的腐败官僚的名单。从1978年末开始的中国学生的民主化运动到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最后阶段出现了一种新的变化。这就是有关民主的概念问题。



一般来说，对民主化的理解包括自由主义、公民权、市民权和自由权。北京美术学院的学生

生在天安门广场建了一座自由女神像，向人们表述了自身对自由权的重视。但是，这一民主的概念只包括自由权吗？1968年，国联采纳了《国际人权条约》，其中记录了民主和人权这两个概念。其一是自由权，其二是社会权。美国的林肯总统宣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中规定黑人可以享受公民权和自由权，但是直到1960年代为止，一直没有实行公民权。究其原因，黑人没有社会权。黑人不能享受教育权和医疗权，而且没有任何的社会权。没有社会权就意味着自由权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

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时，许多民众参加了民主化游行，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中国政府却没有在公共场合承认过。我想通过这次的会议向在座的各位澄清一下这一事实。

为什么我要提这个问题呢？因为1980年代和1990年代以后的新自由主义或者是新左派以及其它各种争论都有他们的派别，1980年代后半期的“新启蒙运动”和“文化热”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第一，这些争论在自身的派别以及许多文化和思想界有一定的影响，而对于维持日常生活的农民和劳动者来说，他们对这些争论几乎一无所知。第二，刚才许先生强调了国家主义和其它一些新保守主义改造了中国，的确国家主义和其它一些新保守主义对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然而，就1980年代后期的状况来说，胡耀邦和赵紫阳和“文化热”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在中共中央产生了反响，更进一步地说，这些影响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中引起了矛盾。有关这一点，我完全赞成刚才许先生所论述的内容。

刘宾雁和李泽厚也如此。张琢先生所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是所有人但大部分人都参加了天安门事件，并受到了影响。天安门事件以后，部分参与“文化热”的知识分子在单位受到了批判。也就是说，思想界的争论不仅影响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3 (1) 2011
的知识共同体。但是，他突然过世了，我也病魔缠身。不知是否还能实现这一理想？当然，我对中国的思想界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我也深深地体会到，目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怀有建立共同体的意愿。为什么会这样呢？许先生的报告给了我们其回答。以上是我的评论。

了中共中央，不只是知识分子，连草根的普通劳动者和农民等民众也参与进去了。有关生活在草根社会中的农民，公安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公布显示，2009年一年发生的农民暴动达到了数万件。他们所要求的都是刚才所提到的社会权。

本来社会权和自由权是不能分开讨论的。刚才许先生所讲的近年思想界的争论在中共中央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但是，在我看来，当今思想界的知识分子并不那么轻率，他们希望得到中共中央领导者的支持。如果追究中共中央领导者的支持的话，参加争论的所有的知识分子就会面临一定的危险性。这一点包括许先生在内，想必大家都是很明白的。

另外一点，因为处于“文化热”时存在着共通性，所以启蒙的共同体才得以实现。然而，为什么当今却无法形成一种共同体呢？这是因为，参加争论的知识分子的观点中出现了很大的分化。因此，无法形成共同体。

但在我看来，从理论上说，意见的分化和态度的分化是很自然的，即使以意见和利益的分化为前提，也有可能追究共同体的形成。真正的共同体是，参加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必然存在利益、认识和意见上的分化。即使将意见和利益的分化作为前提，也可能形成共同体。

然而，为什么没能形成共同体呢？其原因又是什么呢？我不认为意见的对立是其理由。

在我看来，恐惧心才是其原因。如果形成了共同体，其力量就会太强，因此会有被镇压的可能。这是我的主观意见，不知许先生是否同意？无法形成共同体的原因是因为思想界的力量太强了。目前这种力量恰到好处。如果共同体形成的话，其力量就会过于强烈。这只是我的主观意见。其理由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给予我们以这样一个教训。

前不久刚过世的沟口雄三教授和我曾进行过为期6年的共同研究，教授最后的愿望和我的期待是一致的。那就是制定知识共同体，不仅在日本和中国之间，而是要建立一个全世界

●**铃木（主持人）**： 谢谢加加美先生的点评。首先请许先生对加加美先生的发言做一个回应，然后再继续我们的讨论。

●**许（报告者）**： 谢谢加加美教授精彩的点评。那么我想简单地做三方面的回应。

首先，我很赞成加加美教授指出的要区别自由权和社会权的这一观点。大家知道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争取的主要是自由权，是一些比较抽象的权力，但是今天的确可以看到中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农民以及工人的罢工、农民抗争的事件，他们提出的都是一些很具体的要求，这是社会权。

关于这个问题前不久哈佛大学燕京研究所（Yenching Institute）的政治学教授伊丽莎白·培礼访问上海时也和我进行了讨论。她是专门研究中国下层阶级社会运动的，她的看法是，今天农民和工人的事件并不构成对共产党核心权力的挑战。因为他们要求的是在法律下的一些具体的权力，而不是像1989年那样抽象的改革的要求，也不是宏观改革方面的要求。

我同意培礼教授的看法。我认为未来中国的危机不在农村而在城市。之所以中国未来的危机在城市是因为近几年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即“中产阶级的贫困化”现象。

中产阶级原本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但是由于这几年中国的房价狂涨，使得很多中产阶级发现他们的经济状况也不理想，处于一种边缘化状态。也就是说他们也买不起房子。而这些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的、买不起房子的中产阶级，一旦他们提出要求，他们的要求不会仅仅满足于社会的要求，还会进一步提出他们的自

由权。所以，未来中国推动这一改革的可能不会像 1989 年的大学生，而会是城市里的一些白领阶级。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启蒙思想运动”和上层的关系问题。这样一种关系的确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有些知识分子他们关心的是怎么把一些想法送到中南海以影响决策。但是更多的知识分子是把自己的想法通过传媒来影响社会、影响决策。现在中共也开始意识到政治的合法性不能仅仅来自于人民的生活，而且也需要来自民意的共识。所以，借助公共舆论来影响政治现在也成为知识分子和政府沟通的一种新方式。

第三个问题，也就是知识分子共同体问题。我很赞成加加美教授和沟口雄三教授这种期盼有一个知识的共同体的愿望。事实上要求目前的知识分子在意见和利益上达成一致是非常困难的。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共同体。

虽然这么说，但这需要一个前提。也就是说，大家都要承认除了利益和价值，还有一种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公共理性。因为只有具有公共理性之后，才能讨论一些非常有分歧的问题。但是在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内部这一共同的理想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所以一旦发生分歧，就会出现全面的分歧，甚至人际关系也完全破裂。所以我对当今的知识分子已经没什么期待了，我期待的是坐在那儿的一些下一代的知识分子。

●张琢（提问者）：我有一个问题。您有没有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从近代到现代进行过“划代”？您所讲的“下一代”是指哪个年龄段？大概是第几代？

●许（报告者）：鲁迅和李泽厚都曾经对近代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划过代，我自己也对此做过研究。我是把近代以后的知识分子分为六代人。首先，以 1949 年为轴，分成前三代和后

三代。1949 年以前的知识分子以“五四运动”为中心，分为“晚清一代人”、“五四一代人”以及“后五四一代人”。1949 年以后的三代是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的。第一代被称为“十七年的一代”，这儿的十七年指的是 1949 年到 1966 年。第二代人就是“文革的一代”，即红卫兵一代。第三代是“文革后的一代”。但是事实上从文革到今天已经过去 30、40 年了，又产生了两代人。比如今天中国经常会出现一个名词叫“80 后”，即 1980 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

●加加美（评论者）：有关发展权的问题，原先在 1960 年代后半期到 1970 年代国际学术界中出现的从属理论和中心边缘理论对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发展中国家主要受到了发达国家的开发援助，当这一发展的可能性达到一定的水平以后，从属的关系就无法脱离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发展中国家无法实现高度的发展。1970 年代后半期开始了 NIES 的开发，1980 年代又开始了 ASEAN 的发展，最后是 1990 年代开始的中国的高度成长，特别是刚才许先生提到的 1992 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以后。现在印度也开始了高度的发展。

1987 年，国联总会采用了一个决议。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可以享受所有的发展权。部分人相信从属理论，如果发展中国家开始高度成长的话，必定会引起大规模的环境污染，造成重大的能源问题，所以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的发展提出了异议。中国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以后，在人权方面受到了发达国家的批判。于是，1991 年，中国政府发表了《人权白皮书》，在此表明中国是有发展权的。

此后，1992 年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讲话”，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些都是 1987 年的国联总会的发展权，以及 1991 年的中国的《人权白皮书》中中国表示有发展权的延伸，这样邓小平才在中国的南方视察讲话中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3 (1) 2011 并且想向许先生赐教的是，在您所知道的目前的中国，谁为什么会这样？如果可能的话，请做详细的解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中国是否存在知识分子论的普遍性？并且这种知识分子论还面临着是否可以和日本、美国以及欧洲的讨论相结合的问题。就刚才加加美先生提到的理论来说，对于知识共同体的看法在各个地方展开着各种争论，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何种程度的自我意识？是否知道自身讨论的问题对世界具有普遍意义？如果许先生能结合这些问题来给我们做一些解释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这样就可以将刚才加加美先生所说的发展问题以及如何普遍地作为世界的问题来考虑这些问题结合起来。如果可能的话，请将加加美先生和我的问题结合起来，做一个回答。

那么，会场的参加者中有没有想提问的人？如果有的话，我们稍后请许先生一并作答。

●高明洁（提问者）：我有一个问题。像我这样在国外搞中国研究的研究者其实是非常痛苦的。其痛苦的原因也许和加加美先生刚才提到的开发和发展问题有关。因为我们中国学者应用的社会学的概念实际上都是以西方的学术概念为基准的。我们现在是在用西方 18 世纪或 19 世纪的学术概念解释着中国目前 21 世纪的现状。尤其是中国的社会学从 1950 年代到 1980 年代初期中断了 30 年之久，那么这是否也能用西方的学术概念进行解释呢？的确，中国的学术和西方学术有 100 多年的差距，从这一现实来看，我们这些中国研究者就是被西方开发的对象。有关这一问题许先生是如何考虑的？

●学生（提问者）：刚才加加美老师还有各位老师都提到了公共理论问题，而且许老师刚才也说到寄希望于下一代。但是下一代的年轻人是生活在上一代的知识分子的包围中的。为什么公共理性无法在上一代形成？对于上一代无法解决的这种公共理性的氛围，我们下一代又该如何摆脱这种束缚呢？

许先生在报告最后强调了发展主义和国家主义，发展主义是否有其出路？我想应该是有的。去年年末在爱知大学召开的研讨会上，我强调了发展和开发原本是应该区别开来的。在英语中，将两者都翻译成了“development”。“开发”是他动词，而“发展”则是自动词。作为一个自动词，“发展”则应具备保护发展的主体性，而“开发”则是一个他动词。开发不能没有开发的对象。开发有其主体和客体上的区别。

在进行西部大开发时，住在西部的人们不能发挥其主体性，而只是接受着外部开发的资本和资金，所以是被动的。如果只是被动而不是主动的话，就会出现环境污染等众多的矛盾。另外，如果不承认发展主义发展的主体，那么，这在概念上不应该称为发展主义，而应称之为开发主义。这就是我的意见。原本开发和发展的区别，发展主义的实际意义和作用开发主义。开发主义完全忽略了当地人民发展的主体性。这就是我说的这不是发展主义，而是开发主义。



●铃木（主持人）：谢谢。加加美先生的论点十分重要。那么，让我们回到知识分子的话题。

刚才许先生提到了将希望寄托于下一代的公共理性上，在人类史中讨论知识分子时，很少有超越人际关系的知识分子论。不论在欧洲、美国还是日本，知识分子中都存在着谁和谁关系不好、谁和谁关系好，在此我们所感兴趣的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3 (1) 2011
一些独特的问题表现方式。也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如果中国真的有一种方式可以解决其问题的话，那么，中国会对世界其它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

曾经有一位美国的教授非常忧虑地和我谈过这一问题。他说如果中国最后可以证明不要西方式的民主就可以满足一般民众的发展和希望的话，那么，众多发展中国家就会不去学美国，而是来学中国。但用加加美教授的概念解释的话，它只是开发，而不是发展，它缺乏主体性。世界上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的个性，但是就一般的人性而言，差别并不那么大。我想中国的问题也可能是世界的问题，中国的未来也肯定和世界、特别是东亚的问题密切相关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超越西洋理论这一问题。确实，今天我们用的都是西方的概念，而研究的却是非西洋的问题。现在也有不少中国学者说要把西方的概念抛在一边，要用中国自己的学术概念来说明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在我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抛开西方的概念来描绘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概念。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越是那些将理论和概念应用广泛，它的内涵实际上就变得越复杂。这就意味着，我们即使用西方的概念也能比较成功地来研究中国的问题，只是我们不能把这个概念的西方的内涵简单地驾套于东方社会。

过去日本也吸收了中国的儒教，但是日本的儒家和中国的儒家非常不同，它能够提供和描述当时日本的一套价值观。所以在我看来，今天我们可以继续用西方的这些概念，而这些概念是便于进行国际理解的，但是我们可以赋予这些概念以新的内涵。

第三个是有关中产阶级的问题。如果以收入为基准的话，中产阶级占中国总人口的比重现在可能有14%左右。但是在我看来，中产阶级不是一种收入的概念，而是一种与意识形态相关的文化的概念。通常中产阶级认为自己相对来说是体面的，相对来说是比较成功的。

●虞萍（提问者）：我想就刚才许老师对加加美老师的点评的作答内容做一个确认。您刚才说，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未来中国，与其说农村问题严重，不如说城市问题更为棘手。并且您谈到在目前中国的城市问题中“中产阶级的贫困化”问题尤其严峻，其原因之一为房价的飙升。那么是否只要解决了城市的房价问题，城市问题就能得到缓解？另外，您对“中产阶级”这一概念是如何理解的？因为据我所知，在中国对“中产阶级”有各种界定方式。有些是根据个人的收入来定位中产阶级的。您又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学生（提问者）：我想提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海耶克式的自由主义和罗兹式的自由主义可以在目前中国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中自由地展开讨论吗？

●铃木（主持人）：美国和日本面临着“中产阶级消失”的问题。“中产阶级消失”也就意味着“民主主义的危机”，在美国是一个被普遍讨论的问题。具有同样危机感的中国是否也展开讨论了呢？我对此非常感兴趣。

●许（报告者）：谢谢各位的提问。问题挺多的，我尽量一一做简短地回答。

首先就是关于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具备不具备普遍性。我想说这肯定是有的。因为在我看来，如果没有普遍性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就没有意义或者意义是不大的。中国知识分子现在考虑的问题当然主要是中国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实际上也是和其他国家、民族碰到的共同的问题是有关的，这里面涉及到一些现代性的问题。

例如，“是发展优先还是人权优先？”“是自由更重要还是平等更重要？”这些问题并不是说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已经解决的，他们也同样面临着这些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中国有

问题在于，当今中国不少城市中的中产阶级，自以为是中产阶级的人有很强的挫折感，他们认为自己是失败的。去年中国有一部非常流行的电视剧叫《蜗居》，讲的就是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过去这些年轻的白领是比较自豪的，今天他们却有许多不满。当然能不能买房子、是否买得起房子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要解决中国高房价问题是非常困难的，房价如果继续上涨，这些中产阶级恐怕会有更大的不满，会造成很大的经济危机。但是如果房价急剧下跌，地方政府就要破产，而又会使得相当一批靠贷款买房的中产阶级出现负资产。所以，今天城市的问题、中产阶级的问题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开始讨论这些问题。

中产阶级的要求比一般的农民要高得多，他们不会只有经济上要求，还会有政治以及文化上的要求。香港这几年民主化的要求尤为高涨，今年出现了年轻学生用暴力的形式来攻击政府的事件。这是史无前例的。这也和新一代中产阶级的出现有关。所以，今天在城市里民主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只是没有一个事件让它表现出来。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公共理性是否寄希望于下一代这个问题。的确，形成这样一个知识的共同体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不能仅仅寄希望于下一代。改变一个制度一夜间就可以实现，但是改变风气需要三代人。所以有一种戏言说“做中国人要有耐心”。

最后一个是问题是中国能不能公开地讨论海耶克和罗兹的问题。在中国，从学术角度可以讨论任何问题，但是你不能把它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讨论。比如你从海耶克开始批评中国的政治制度，那就不允许了。

所以中国今天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重要的不是你说什么，而是怎么说”。所以有时候阅读中国学者的文章是比较累的，因为很多人是在用学术的方式讨论政治问题，政治的意见隐藏在学术语言的背后。

●铃木（主持人）：谢谢！就许先生现在作答的内容，大家是否还有什么疑问？

●学生（提问者）：从“六四天安门事件”以后，我感觉大学里面的言论被控制得特别严格。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用QQ在网上聊天，小组里大家说一些话，讨论一些问题，有时会发一些牢骚。这时候，就会被警告这些话不要在公共场合说，很多人都会盯着你的，可能会有人报告老师。他们不一定会批评你，但可能会有一个黑名单会注视你，当然不对你产生多大的影响。所以作为一个学生，我就会觉得，他们都盯着呢，我还是尽量老实点儿吧。我反而感觉“六·四”之前的知识分子很有追求，敢于说很多东西，反而现在的大学生，好多都是被压抑的。我想知道许老师对这一问题有什么看法？

●学生（提问者）：我想谈一下有关汪晖事件。其实，我并不想谈论汪晖事件的本身是怎样的，但是通过这个事件，在发生到现在已经经过了比较长的时间了，但中国国内的知识界还在争论，甚至是论战。并且这个事情又牵涉到其它很多学派之间的左右之争。就感觉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学界里出现的一些问题都不能解决好。那么他们又怎能有能力或者说有承担解决社会和国家问题的责任呢？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老师刚才提到的知识分子和学者之间的公共交往的问题。近代中国有戏院和沙龙有咖啡厅这些公共的场合，给知识分子提供了面对面交往的平台，而汪晖事件则是在媒体的论战中展开的。当知识分子之间没有形成面对面的理性的平台时，问题就很难解决。虽然这次事件的当事人汪晖一直没有出来表态，但是通过这一事件，我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到底在哪里”这一问题深表疑虑。

●加加美（讨论者）：汪晖问题没有进行面对面的谈话，结果缺乏了公共性，以至于这场争议还在无限制地进行着。

●铃木（主持人）：近代株式会社的投资、民主主义也具有以咖啡厅为契机形成的历史……。

●学生（提问者）：我也想说两句。现在在中国看新闻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专家对某个事件进行评析。但是这时候出现的专家有时就体现了政府没有诚信的行为，我觉得老百姓对此还可以接受。但很多作为权威的专家，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居然提出很多荒谬的言论，就让普通人也会觉得很荒谬的言论。

例如，自行车的污染要远远大于汽车。专家论证有可能背后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去购买汽车，以驱动国内的消费。如果政府提出一些不现实的理论的话，还可以接受，因为它背后涉及到消费。但是作为专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完全不顾及自己的人格在公开的场合提出一些荒谬的、或者说作为利益代言人的公开的言论的话，这就无法接受了。

中国知识分子的蜕变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是不是有必要让知识分子来反省自身？还是应该让社会来影响他们？或者说刚才提到中产阶级的概念，很多是以经济的标准来评判的，我们能不能在中产阶级的概念中加入一个道德问题呢？

●浅井正（提问者）：结合大家的提问，刚才加加美先生提到的中国的《人权白皮书》，作为一个律师，我认为有了国家就有人权，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刚才许先生说中国的人权和欧洲的人权完全不同，这使我大为吃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让我深受感动的话语。有关这一点，中国当今的知识分子和中国政府到底是以一种怎样的方式来看待这一问题的？如果用辩证法来解释的话，“有了国

家才有人权”，这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否有“应该怎么办？”这一问题的定义？希望许先生能够结合刚才大家的提问做一些解释。

●铃木（主持人）：一般来说，在欧洲有了国家就等于有了人权。为了和基督教势力进行对抗，近代国家成立时就对抗性地出现了“人权”这一概念。基督教团体或是其他什么团体呼吁人权的话，在欧洲史尤其是法国史看来是一个十分荒唐的讨论。慈善团体对人权，例如基督教团批判“中国的人权镇压”时，在欧洲的知识分子看来是不可理喻的。也就是说，不应该从教会一方出发，以“人权”这种形势出台其实是近代国家言说的一种延续。

●许（报告者）：问题很多，我尽量做简短地回答。

第一个是有关大学的问题。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是过分的恐惧症。因为在中国的言论自由问题上，我们应该承认比1980年代有进步。关于言论自由这一问题，我们要分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这两个不同的部分进行分析。在私人空间这一部分，实际上中国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国家。你在我面前可以自由地批判政府或国家领导人。但在公共空间里，你要把一些观点公开发表甚至付诸于行动，那么这方面依然控制得很严格。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专家的评论缺乏公共的信用，他自己完全被利益化的这一问题。哈贝马斯在谈到公共领域时说，到现在为止公共领域碰到两个威胁，一个来自于权力，另外一个来自于金钱。这两个问题在中国的媒体特别严重，很多专家之所以说这些话不仅是专家被收买了，实际上媒体也是被收买的。

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最近在长江流域出现了一次很大的洪水。现在直接冲击到了三峡水库。10年以前专家说，三峡水库可以抵挡1000年所没有碰到过的洪水。5年前改口说，它可

ICCS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Vol.3 (1) 2011
不仅是一个物质上的生存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在政治、社会中平等的、受尊重的权利。但是今天中国的法制还非常不完善，大量侵犯人权的现象频频发生，这里既缺乏民主，同时更缺乏的是法治。

以抵挡 100 年没有碰到过的洪水。3 年前又改说，三峡水库可以抵挡 10 年没有碰到的洪水。最近的说法是，不要指望一个水库能抵挡所有的大洪水。同样的一批坚决主张三峡水库的专家的口里，几年间发生了这么大的评价上的变化，完全没有责任感所言。就是说在公共领域里缺乏的是一些独立的意见和具有独立精神的专家。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现在也有一些变化，比如在网络这种比较开放的媒体里面，已经有很多从权力和金钱中独立的声音。

第三，关于中产阶级道德的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中产阶级我刚才说不是一个经济收入的概念，更多的是一个文化的认同和文化的品位概念。但是我并不认为对中产阶级应该有一些特殊的、更高的要求，因为他们和官员、和知识精英是不一样的。我们只能对一些在社会上有特殊权利的人提出比较高的要求。而中产阶级是普通的人，我们只能用一般的道德要求来要求他们。

最后关于人权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非常重要。在我看来，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有两种错误的观点。一个是您提到的“有国家才有人权”这个观点，另外一个是把人权简单地解释为生存权。“有国家才有人权”的观点是一种法律实证主义的观点。事实上，从自由主义的观点来说，人权是高于国家和法律的，它是先于国家和法律而存在的。人权虽然需要法律来保障，本身它不是来自于法律，而是来自于一些更高层次的法和最基本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就是，人应该有一些普遍的、应该享受的基本权利。海耶克称之为“立法的根本原理”，以宪法和法律优先。由于人权是出于“立法的根本原理”的，因此不是出于实定法的。即使人权需要法律的保障。一个无法保障基本人权的国家，它是缺乏正当性的，所以这样一种“有国家才有人权”的观点在我看来是有问题的。关于人权首先是生存权的观点，同样也是错误的。

所以前不久温家宝总理说，“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这就意味着，人权

●**铃木（主持人）**： 谢谢许先生长时间精彩的报告。时间差不多了，最后，请加加美先生做一个最后的补充，然后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

●**加加美（评论者）**： 有关把国家作为前提的人权，我最后想做一点补充。1787 年的法国革命时公布的人权宣言的正式的名称是《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在中国，有关人和公民的权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公民的“公”的概念。正如刚才铃木先生所说，民主国家也可以说是公民国家。以公民为前提的国家才有人权。公民是人权的前提，公民国家是以人权为前提的。如果你否认公民国家的话，那么你就没有人权了。这就是自由权的反论。这一自由权的思想来源于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自由权的反论是在法国革命时因为产生了断头台的恐怖政治而形成的。但是，以法国为中心的发达国家，在公众场合指出所有的人都有人权，而他们为什么要侵略亚洲和非洲？将它们作为自己的殖民地呢？并且还要杀那么多人？我为什么要强调社会权的重要性呢？因为社会权和自由权是无法分开的。

为什么我要强调官僚腐败问题呢？因为“六四天安门事件”时有 100 万人参加，学生以外的农民和市民也参加了民主化运动。这是因为官僚腐败和社会权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地方的官僚也存在无视地方人民和农民的社会权的问题。就生存权来说，这是以公民国家为前提的公民的生存权，没有公民意识的民众就意味着没有生存权。农民、少数民族等一般民众是否有公民意识？这说起来很简单，但要确认的话却很难，因为确认公民是否想参加国事是

很难的。日本人也不例外，又有多少人作为公民参加了国事了呢？这在生存权和社会权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中国，“80后”的大学生很难找到工作，他们不愿离开大学所在的城市，于是便以团体的形式住在郊区，中文把这些人叫做“蚁族”。根据一本专门研究“蚁族”的书所说……

院常务副院长、历史系教授。

●张琢（提问者）：中国早就有这个概念了。杜甫和刘备所作的诗中都提到过这一点。

●加加美（评论者）：张琢先生说这个词语以前就有。在此问题的所在是，他们不可能以团体的形式发起游行运动。但是，他们却通过因特网进行着集团性的活动。因此不是一种直接的行动。虽然因特网的言论可以影响中央政府的政策，问题在于公共空间，因特网是否可以形成一个公共空间呢？沙龙和咖啡厅这种面对面的空间可以形成公共空间，而因特网的话就很难形成公共空间了。所以，在因特网上的讨论很容易引起对立和争论，无法简单地建立共同体。由于因特网可以匿名，因此像刘晓波的《08宪章》这样的署名运动是可以进行的，但我们是否可以称其为公共空间呢？

●铃木（主持人）：现在，已经开创了面书（facebook），新的因特网交流圈正被不断地构建着，有关这方面的话题我们以后再谈。衷心感谢许先生、加加美先生以及在场的各位。谢谢大家！（完）

（翻译：虞萍）

注释

* 本文是以作者2010年7月在ICCS研讨会发表的文章为基础修改而成的。

¹ 许纪霖，中国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